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儒道合一的思想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陈雅楠 顾晓燕

摘要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脱离仕途、回归田园之名作，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逐渐由儒家思想主导向道家思想主导的转变；还能看到陶渊明由于自身、社会背景、儒道本身的可融性的原因，最终将儒道两种思想完美融合。

关键词 《归去来兮辞》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原因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4- 8- 30

陶渊明(约 365—427)，字元亮，晚年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对于陶渊明的基本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实际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多元的、复杂的，他既拥有“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儒家理想，也有超脱世俗的淡然。本文拟从陶渊明脱离仕途、回归田园之作《归去来兮辞》出发，深入探讨陶渊明儒道合一的思想。

一、无法割舍的儒家理想

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诗文完全超出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1]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并非一开始就离群索居，反之他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一)。可见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陶渊明同屈原一样，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这也奠定了他“大济于苍生”的最初理想。早在陶渊明还是个热血青年时，就在他的诸多诗文中表达了自己强烈和迫切的出仕愿望，称自己“猛志逸四海，骖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自 29 岁至 41 岁的 13 年中，正是陶渊明思想成型期，同时也是思想矛盾期，但从当时的诗文可以看出此时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

出仕是最初的理想，但残酷现实却让他难有所为，不愿再“以心为形役”，因此决定辞官，回归田园，写下了《归去来兮辞》。所以在《归去来兮辞》中不仅可以看到陶渊明回归田园的宁静和欣喜，更有脱离仕途的无奈和沮丧。“请息交以绝游，事与我而愿违”，这是对现实怎样的不满和失望，才能发出如此决绝的感慨，可见脱离仕途实属无奈之举，壮志难酬的陶渊明内心十分痛苦。“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看似是感叹时光短暂，其实更多的是辞官的无奈和不能实现“大济于苍生”理想的痛苦。“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诗人感受亲人的温暖，醉心于弹琴和读书，但这些更是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否定现实，避世的行为。“聊乘化以归尽”暂且回归田园，一个“聊”字更是体现了诗人隐逸只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使陶渊明达不到“济天下”的夙志，只有选择“善其身”。写下《归去来兮辞》归隐田园后，他没有放弃自身的修养，研读史书，在他后期的作品《咏三良》中，他对三良的细致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且他能安于贫困的田园生活，如袁行需所言在“固贫”和“安贫”上，陶渊明是纯粹的儒家思想。

二、顺应本心的道家归宿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脱离仕途，回归自然的宣言，道家思想就是自然理性化思想：生活俭朴、思想天真、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2]。这一切的要求都在陶渊明身上完美地体现，从

《归去来兮辞》中可以读出他如何将这种道家思想发挥到极致。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再度为官的原因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困顿，然而在生活如此潦倒的状况下，他还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毅然决然回归自然，这不正是道家自然思想强调的“生活简朴、甘其食、美其服”的表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虽然暂且“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但是内心还是无比渴望回归本心、回归自然，想要保持自己本来的、脱俗的、天真的性情。“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陶渊明倚着南窗寄托他傲世的情怀，也能在如此狭小之地与日常中寻觅到乐趣，可见他热爱自然，“乐于俗”，渴望达到道家物我两忘、乐安天命的精神境界。

再从《归去来兮辞》的细处来看，文章运用了大量的象征词汇。每个时代的诗人对于花草树木的偏爱都表现出他们对于人生的不同理解^[3]，陶渊明在千芳百艳中独爱菊花，因为菊花最能表现他避世的思想，“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将自己喻为鸟儿在经历“迷途”后，决心回归，甘心做一朵无拘无束的白云。再者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道家代表庄周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之精髓所在。众所周知陶渊明同李白一样，生性爱酒，他的诗文几乎“篇篇有酒”，同样在《归去来兮辞》中，他也曾希望“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由陶渊明爱酒的程度就能看出他思想深处对道家绝对自由的渴望。

无论从文章整体思想，还是从细处象征意义的引用，我们都可以看出陶渊明在决心辞官后，不断地从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小道”逐步发展到超脱世俗、与自然融合的“大道”，道家思想早就在他的心中不断生根发芽、渐渐长成一棵大树，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主导。

三、陶渊明能将儒道思想融合的原因

1. 自身原因。要想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就必须谙熟两家思想。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东晋开国功臣，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死后追封大司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其父陶逸官至安城太守。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陶渊明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对儒家思想谙熟于心，朱自清曾经统计，在他的诗作中仅对《论语》的引用就多达 37 处。受到如此深的儒家思想影响，才使得陶渊明从小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会如此积极地出仕。

但是陶渊明的父亲在他八岁时就过世了，他被寄养在他的外祖父孟嘉的家中，孟嘉是东晋著名的文人，精通玄学，家中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这为陶渊明接触各类思想奠定了基础。因受外祖父影响，陶渊明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了很多道家的“老庄之学”，这就为他日

敦煌历文俗语词考释五则

□ 许昌学院 于正安

摘要 敦煌历文是敦煌出土社会经济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文章对“楼上”、“离”、“箠”、“色物”、“栖木”五个俗语词进行考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误录、误释之处,从而可为汉语词汇史、辞书编纂提供材料。

关键词 历书 出土文献 近代汉语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 8- 23

敦煌历文是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有关会计的文书,多属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可分为寺院、官衙、社邑三类,其中尤以寺院历书数量最多,包括诸色入破历、常住什物点检历等方面^[1]。敦煌历文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中外交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经济方面,更是研究唐五代时期我国经济制度以及寺院经济宝贵的第一手数据,历来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成果也最为丰富。实际上,从语言角度看,敦煌历文口语性强,方俗语词夹杂其中,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今选取敦煌历文中出现的五则词语试加考释,以就教于方家。

楼上

1.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十五日,楼上祭拜酒壹角,北宅酒壹斗……廿七日,楼上镇压酒壹瓮。”

2.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又衙官令狐回君传处分,楼上纳粗布两疋。”

本指“楼之上”,为方位短语,这里借指归义军节度衙门。唐代节度使持节上任时,要筑“节楼”以藏之,并且在“节楼”办理公务,后来就以“楼上”代指节度衙门^[2]。这里运用了借代修辞法造词。其他敦煌文献亦见“楼上”代指归义军衙门之例,如S.3565《曹元忠设斋功德疏》:“弟子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于衙龙楼上,开龙兴、灵图二寺大藏经一变请大德九人,启扬鸿愿,设斋功德疏……”

后将儒道合一的思想提供必要条件。

2.社会背景原因。陶渊明约生于365年,卒于427年,他生活在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时的东晋社会动荡,大家世族对于兴邦治国一无所知,但“九品中正制”的存在却阻碍了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人改革政治。政治的黑暗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由此发生农民暴动,人民陷入战争的痛苦中,而就在此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断激化,陶渊明要想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安心实践他的儒家理想,想要有所为是不可能的。

再者,因为社会的动荡,儒家的国教地位也渐渐失去了,今文经学和纬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玄学思潮这种新道家思想应运而生。生活在如此环境的陶渊明,袁行霈先生也认为:“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3]在黑暗的社会背景和玄学兴起的学术背景下,陶渊明只能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融合。

3.儒道自身的可融合性。作为中国古代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派,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是相互否定、相互背离的。但是由于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对于当时如此动荡的东晋而言,单一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相互融合、合二为一才能在乱世中保持自我。

任爱君认为“楼上”是对回纥人“楼”的一种变称,“在游牧民族建立的行国政权中,可汗的斡鲁朵(即‘楼’)在事实上是汗国一切权力和事务活动的中心所在,所以又被称为汗宫。因而,在敦煌地区,这一南北民族文化交融最为深刻的区域内,出现了以少数民族语言或称呼来指代瓜沙归义军政府首脑机关的现象,对于当事者的双方来说都是极为自然而又顺理成章的”^[4]。任氏认为“楼上”之“归义军政府首脑机关”义为外来词义,恐非,理由有二:一是归义军政权奉中原王朝正朔,节度使旌节的授予必定依照唐朝的规定,有统一的仪式,于史有据,后来用以代称节度使衙门也顺理成章,无需异语求义;二是“斡鲁朵”应为突厥语ordo的音译,意为宫帐或宫殿,似与“楼”相差悬殊,而“楼”字早在睡虎地秦简中就已出现,《说文》也已收录;回纥等北方民族属于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ordo”(即“斡鲁朵”)应是与其游牧民族习惯相适应的居住形式,而“楼”则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唐五代时期的敦煌虽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频繁,但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敦煌一直以汉族为主,“楼”作为汉族建筑形式肯定也在敦煌有所反映;另外敦煌历文还有“楼子”一词,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同日宅内营亲支造楼子粗纸壹帖。”S.6249《归义军时期军资库司纸破历状稿》:“同日,准旧南院赛神纸拾张,大院楼子赛神纸柒张。”因此,我们认为历文中“楼上”的“归义军节度府衙”义是汉语自身基于借代

儒家和道家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在人生取向上儒家是“仕”,道家是“隐”;在政治目标上,儒家提倡“有为”,道家提倡“无为”;在适用时代上,儒家适用于“治世”,道家适用于“乱世”等。在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文化有儒有道,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用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儒与道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这才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陶渊明将儒与道二者融合正是一种尊重文化规律的行为。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辞官之作,其文不但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而且还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阐述了他的基本思想。陶渊明的思想很复杂,他内心渴望的是道家潇洒自在的隐逸生活,但归隐后却始终不能割舍心底的儒家理想,因此他融合儒道两家思想,在道家思想主导下,将儒家思想消化、吸收、调整进去,使其有机结合,形成他别具一格的思想特征,成就他卓越不凡的品质。

参考文献

- [1]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2]蒋文华.陶渊明入世与出世的冲突与融合——儒道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J].现代语文,2007(10).
- [3]苗天宇.从周敦颐《爱莲说》看“慎独”思想[J].兰台世界,2014(12).
-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